

郑欽安医书阐释

吴阶平题



传

李一庵



医理志

医法圆通

伤寒论

李一庵



〔清〕郑钦安原著

唐步祺阐释

巴蜀书社

〔清〕郑钦安原著 ● 唐步祺阐释

郑钦安医书阐释

- 医理真传
- 医法圆通
- 伤寒恒论

巴蜀書社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设计：李文金

封面题签：吴阶平

郑钦安医书阐释 清·郑钦安原著 唐步祺阐释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8.375 字数 550 千

1996 年 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350 册

ISBN7-80523-685-2/R·10

定价：34.00 元

阴阳为纲,辨证论治(代序)

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寿全,字钦安,四川邛州固驿镇(今成都市邛崃固驿镇)人,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享年87岁。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名医刘止唐先生(刘氏著有《十三经恒解》及有关子、史、诗文集等书数十种),教其熟读深思《内经》、《周易》、《伤寒》诸书。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探索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之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故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兹就其对仲景学术的发挥作初步探讨。

一、阴阳为纲,尤重心肾阳气

《医理真传》自序云:“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医法圆通》自序亦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这两篇自序可以看出郑氏抓住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贯穿在全书之中而大加发挥。他以《周易》丰富的辩证法和天地整体运动为指导,用八卦原理阐发人体生理病理的阴阳法则,堪称

精妙之至。其中坎卦解、离卦解、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尤属切要。他说：“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离为火，属阳，气也，而真阴寄焉。中二爻，即地也。地二生火，在人为心，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人身之主也”。从此论点出发，则心肾为人身立命之本，人身赖以生存的元阴元阳，彼此互为其根，相互依存转化，体现出分之则二，合之则一的对立统一观。他说：“坎中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阴，肇自坤元，二也。一而二，二而一，彼此互为其根”。这也是对《素问·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的阐发。以此立论，联系人体病理则认为“此阴阳二气原是均平，自然百病不生”。如果不能使之均平，故有盛衰之别，水盛则火衰，火旺则水弱，此阴症、阳症所由来也。并强调“要知阴阳调和之人，六邪不侵，七情不损”。“发病损伤即有不同，总以阴阳两字为主”。在辨证论治中，也始终突出阴阳这个总纲，阴盛者阳必衰，阳盛者阴必弱，不易之理也。他总结的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是临床数十年之经验所形成，也是对仲景学术的丰富与充实。在辨认阳虚症时说：“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在辨认阴虚症时说：“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

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这两节阳虚、阴虚辨证纲要,在《医理真传》卷二、卷三中,并列举 31 条阳虚病症,29 条阴虚病症,采取问答形式,详加论证,反复推明;最切实用。又在《医法圆通》卷一、卷二中,对心病不安、肺病咳嗽等 51 种病症,逐证逐条分辨,充分体现了仲景辨证论治以阴阳为纲,并联系实际的具体运用方法。然而郑氏在阴阳两纲中,特别着重阳气,认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在论气血二者,气占主导地位,指出“人体合而观之,一阴一阳而已,更以阴阳凝聚而观之,一团元气而已”。他特别强调坎中一点真阳的作用,为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其说:“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症时必首先考虑元气盈虚损伤情况,以扶阳救逆,抑制阴邪,他善用大辛大热的姜、桂、附之类来治疗阳虚虚损之证,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大症、重症,被人们尊称为“郑火神”。可以说,他把伤寒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大量运用理中、四逆辈治疗诸种杂病,如血证、心痛、头痛、咳嗽、脐痛、中风、发斑、胃痛、痿痹、谵语,以及耳、目、喉、舌、齿、鼻等百余种病证,均能见微知著,活法圆通,技巧独超,疗效卓然。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大大扩展了仲景三阴症四逆辈的治疗范围。笔

者遵郑氏重阳气之旨，曾治一心病不安之患者李某，男性，年已60，面容苍白无神，声音细小，两脚浮肿，特别怕冷，虽暑热炎天，两足亦冰凉，口干口苦，咽喉干燥，口中无津液，但不思饮水，脉浮数，西医诊断为“心房颤动”，脉搏一分钟达120次，动则气喘，心慌不安，舌质淡红，苔白滑。乃师法郑氏用补坎益离丹治之，连服五剂，服后自觉咽喉干燥减轻，口中微有津液，无其它不良反应。其后附片用量逐渐增加至每剂200克，连续服20剂，自觉精神好转，两脚浮肿消，不复畏寒，口中津液多，已不口干口苦，脉搏稳定在一分钟95—100次左右，继服用原方加补肾药物，如蛤蚧、砂仁、益智仁、补骨脂、仙茅、黄芪、人参等，又续服20剂，脉搏每分钟85—90次，其它症状消失而告愈。此方重用附子以补真阳，桂枝以通心阳，真火旺，则君火自旺；又肾为水脏，真火上升，真水亦随之上升以交于心，水既上升，又必下降；复取蛤粉之咸以补肾阴，肾得补而阳有所附，自然合一矣。况又加姜、草调中，最能交通上下，故曰中也者，调和上下之枢机也。此方药品虽少，而三气同调，心肾相交，水火互济，故治之而愈。郑氏说：“余意心血不足与心阳不足，皆宜专在下求之，何也？水火互为其根，其实皆在坎也。真火旺则君火自旺，心阳不足自可愈；真气升则真水亦升，心血不足亦能疗”。由此可见，郑氏之重阳气实际是重少阴肾中之阳也。

二、百病不离六经气化

郑氏说：“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的真机”。从气化方面对伤寒进行阐述，对六经各作证解、附解，证解是六经大旨，附解是补六经未发之大意，颇有精卓之见。他说：“今人只知冬月为伤寒，不知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皆有伤寒，只要见得是太阳经证的面目，即是

伤寒也”。他认为六经各有标、本、中三气，客邪入于其中，有从中化为病，有不从中而从标化为病，有本气为病。邪入一经，初见在标，转瞬即在中。如果不细心辨证，便不了解邪之出入变化。所以六经受病均可依据其标、本、中气的变化进行分析。三阳之病是阳盛阴亏，故救阴为先；三阴之病是阴盛阳必衰，以温补为要。但阳中有阴症，阴中有阳症，则须弄清三阴三阳互为表里的气机。并按照辨阳虚症、阴虚症法所举似实而虚，似真而假的诸种实况而施治，始能无误。他同时指出“真阳之气机发动必先行于太阳经，而后行于诸经”。这样就特别强调了真阳气机在六经中的重要性，因而标、本、中气从化立论，都离不开此真阳之气。同时他还认为邪气入于六经与正气相搏，在一定的条件下“阳极化阴，阴极化阳”互相转化，导致了六经病的寒热虚实变化。明确地提出《伤寒论》一书，“通体就在这邪正两字，正气乃六经之本气，六经只受得先天之真气，受不得外来之邪气，邪气即客气也。客气者何？风、寒、暑、湿、燥、火是也。正气旺者，客气不得而干之；正气弱者，客气即得而入之”。他还认为风寒之邪不仅由于太阳经自表及里地传变，而且三阴三阳俱可由于客邪而致病的见解：“仲景首以寒客立论，先提出六经本气，后指出寒邪之客气，或在三阳，或在三阴，……实因人体五脏之偏盛所致”。他认为“仲景虽未将六客逐位立论，举伤寒一端而六客俱在也”。惟一日太阳，二日阳明挨次传经之说，则不可尽拘。郑氏提出“伤寒有传经不传腑，传腑不传经的，更有直中太阴、少阴、厥阴，切切不可拘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上面搜寻，总在这六经提纲病情上体会，即误治变逆亦可知也”。又说：“举伤寒而万病已具，揭六经，明六气，而一年节候已赅。论客气由外入内，剥尽元气，能令人死，步步立法，扶危为安，似与内伤无涉，不知外邪入内，剥削元

气，乃是六经，七情由内而戕，剥削元气，毋乃非六经乎？”仲景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各对准邪之传变，及其所在之脏腑，步步立法施治，不仅不止于治冬月伤寒，且亦不限于外感病。清初柯韵伯亦有伤寒方不只治伤寒病之论。且寒邪入内，剥削元气，自不能不引起内伤，而无论外感内伤，皆使一元真气有损，故谓举伤寒而万病已具。徐灵胎说：“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郑氏驳斥“仲景方是为冬月伤寒立法，并非为内伤与杂病立法”为可鄙，随即举出许多内伤病用伤寒方治愈之实例。如甘草干姜汤治内伤失血、肺痿；理中汤治呕吐、泄泻；小柴胡汤治肝气抑郁不舒，两肋胀痛；桂枝龙牡汤治夜梦遗精；真武汤治肾脏不温，水泛为痰等，亦足证其立说之有据。笔者师郑氏之意，常用甘草干姜汤以治吐血；真武汤以治肾脏阳虚，水泛为痰之证，多能取效。如患者王某，男性，42岁，身体消瘦，面容萎黄无神，两颧突出，耳鸣，两足发烧，虽冬季晚上，足部亦伸出被外，但其它部分怕冷，咳时气紧，吐白泡沫涎痰，略带盐味，舌质淡红，苔白腻，脉沉弦，近月来日益加重，不能平卧，突然咳吐鲜血。从上述种种症状来看，此为肾阳虚寒之证。先以甘草干姜汤守中以复阳，止血而宁咳。炮姜、炙甘草用量各120克，服药两剂后，果然血止而咳亦减。肾为水脏，肾中真阳衰微不能化气行水，水邪上逆，冲肺而咳，以大剂真武汤治之。附片初为50克，继增至120克，连服8剂，咳喘明显好转，痰亦减少，已能平卧，不如从前之怕冷。为加强温中，预防再次吐血，以炮姜易生姜，去白芍加上肉桂以补肾中真阳，又服10剂，诸症消失而告愈。按甘草干姜汤一方，仲景以之治误吐逆烦躁而厥者，取大甘以化热，守中而复阳也，亦治肺痿之虚寒者。真武汤一方，治少阴伤寒、腹痛，小便不利，自下利者，茯苓、白朮补土利水；以附子之辛

热,壮肾之元阳,则水有所主,不致上泛;生姜之辛散,佐附子以补阳;白芍敛阴和营。举此二方,足以说明伤寒方可治内伤杂病。

三、联系实际,阐释条文精义

《伤寒恒论》一书,其特点不在抄袭前人陈说,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切实说理,独抒己见来注释《伤寒论》。如太阳上篇2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注释说:“病发于阳,指太阳也,太阳底面,即是少阴,病发于阴,指少阴也。若专指太阳营卫之阴阳,则与太阳风寒两伤病情不符。余每临症,常见独恶寒身痛而不发热者,每以桂枝汤重加附子,屡屡获效。以此推之,则病发于阴,确有实据。至所言六、七日者,是论阴阳之度数说法也。又如太阳中篇13条:“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注释说:“凡咽喉干燥之人,津液已伤,岂可再行发汗,以重夺其液乎?有因下元坎中真气衰微,不能启真水上升而致者,法宜扶阳;有因邪火灼其津液而致者,法宜清润;有因寒水逆于中,阻其胃中升腾之气而致者,法宜行水”等不同情况,并示人在临症中应细心察之,“若此等证皆非发汗所宜。”这种从临症角度来注释,对后学多所启迪。如笔者治陈某咽喉干燥,其人面白无神,口中无津液,甚至口糜(即口腔溃疡),怕冷,不思茶水,舌质淡红,无苔,脉沉细,椒、姜、炒花生、炒瓜子都在禁食之列。由以上种种病情来看,此由肾中真阳不足,不能启真水上升而致;又少阴肾经循咽喉,挟舌本。故遵郑氏真水不上升之意,先以炮姜甘草汤试服之,无不良反应,随即以大剂四逆汤治之,三味药剂量各60克,连服四剂,咽喉干燥等证悉愈。虽吃煎炒辛辣食物,亦未复发。该书另一特点是限于前人所谈,敢独抒己见,对原文疑误之点进行

辨误纠正。如少阴后篇 13 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他认为按少阴病而至四逆，阳微阴盛也，其中或咳、或悸者，水气上干也；小便不利者，阳不化阴也；腹痛下重，阴寒之极也。法宜大剂回阳为是，而此以四逆散主之，吾甚不解。又厥阴后篇 47 条：“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郑氏认为“夫头痛六经皆有，不将巅顶指出，则厥阴之证，尚属含糊”。类似这种辨疑正误，在各篇中皆有。如辨厥阴后篇 40 条下利证，仅只举脉而无证。注释说：“按下利一证，原有因寒、因热、因湿、因膀胱失职、因中虚、因饮食，种种不一，总要认证分别阴阳实据。……若只是一脉而论证，未免不恰，况脉只数十端，而病有千万，何得只凭脉一端立说？仲景当不若此，定有遗误”。而且对条文中的死证、不治，也提出应积极及时救治，如少阴前篇 21 条：“少阴病，恶寒，身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他说：“能急温之，手足能温者，尚可不死，医者亦不得束手旁观，能无侥幸之一愈也”。示人灵活看待条文的论断，而勿固执。对指导临床有积极意义。

四、结 语

总之，郑氏对仲景阴阳学说和三阴证发挥颇多，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伤寒学家。由于他学识精深，经验丰富，胆识超人，擅长运用大剂量的大辛大热之药愈疾，而名噪一时。他留下的三部著作，对当前临床上治疗疑难病证以无穷启迪，值得研究与发掘。

唐步祺于成都槐树斋

1995 年 3 月

郑钦安传

郑寿全，字钦安，四川邛州（今四川邛崃）人。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87岁。早年学医于夙儒兼名医双流刘止唐先生，从受《周易》、《内经》及《伤寒论》诸书，均熟读而深思之，奠定医学理论基础。继复博览医书七十余种，加以融会而贯通之。行年二十有四，即悬壶于成都，因其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医德亦冠绝侪辈，踵门而求治者常络绎不绝，声望日隆。清同治八年（1869）刊行《医理真传》，十三年（1874）刊行《医法圆通》，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行《伤寒恒论》，三书各具特点，又能理论联系实际，切合临床应用，一时为广大医家视为济世活人之鸿宝。

《医理真传》除综述祖国医学基本理论外，尤着重于治病先分辨阴阳，列举阳虚证、阴虚证之特征，并各举数十例加以阐发印证。其中心论点则谓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以阳为主导，故善于用姜、桂、附等大辛大热药味，量重而准，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大症、急症，而被人尊称为“郑火神”，盖犹昔人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实则郑氏亦常用有石膏、芒硝、大黄等寒凉药味方剂如白虎、承气诸方以治病救人。《医法圆通》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及处方活法圆通之主旨，“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书首《用药弊端说》举出当时医界积习及沿误而示人以用药准绳。书末更指出

善于圆通运用成方，一方即可治多种疾病，如四逆汤一方善用之，即可治愈二十多种疾病。其中颇多独到之处，为它书所未尝论及者。至于《伤寒恒论》一书，特点亦不在抄袭前人陈说，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即情言理，并能独抒己见，对原书疑似之处，加以纠正。其《自序》亦谓：“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不敢与前贤并驾，但就鄙见所及，逐条发明，虽不敢云高出手眼，此亦救世之本心，聊以补名贤之不逮，亦大快事也。”张仲景《伤寒论》，自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问世后，历代注解者无虑百家，郑氏《恒论》能不裨贩陈说，独立于医学之林，诚难能而可贵矣。

然郑氏虽有如此卓越之成就，而过去国内知之者寡，主要由其著作及后学，率局限于川滇一隅。自1981年在首都召开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及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教授著《研究伤寒论的流派》加以阐明后，始确认其与恽铁樵、曹颖甫等同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肯定其在我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吴棹仙等俱受其影响。中医院校教材《中医各家学说》第五版列有专节，论述其成就。1984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其中消渴一节，引用郑氏之言曰：“消渴生于厥阴，风木主气，盖以厥阴下木而上火，风火相煽，故生消渴诸症。”成为消渴症从肝论治创见。郑氏更论及有先天真火浮游于上、中、下而成的三消症，宜从阳虚论治，应导龙归海，治以潜阳、封髓、四逆、白通诸方，始有显效，更为他人所不敢言的以阳为主导观点之发挥。郑氏于祖国医学之贡献，诚为不少不小矣。

江津王利器曰：当中国医学为世界注目之际，传来巴蜀书社出版郑氏《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及《伤寒恒论》信息，殊令人振奋不已。曩者，任应秋教授为之评介其学术价值于前，今兹，唐步祺大夫

为之整理阐释郑氏三书于后，应秋为余同乡，步祺为余同学，余与二君过从甚密，因而得知郑钦安其人。今应秋虽已长逝，不及见郑氏书之重印问世，而步祺为之整理出版，发潜德之幽光，其功为不可没矣。余尝读葛洪、颜之推二家之书，而知注连之病已发现于东汉时代，如郑玄《周礼·疡医》注，刘熙《释名·释疾病》，俱有“注病”之说，特其时对此“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贯注”之病，束手无策，徒凭巫医之“被送家鬼，章断注连”而已。自生长在东西晋间之葛洪出，著《肘后备急方》，始就所见三十四候，为之对症下药，“一方一论，悉已试而后录之”，颇收十全之功。注连，即今所谓结核传染病也。世之言医学史者，相率以此为十九世纪德人科赫（Koch 1843—1910）所发现，而不知在四世纪年代，葛洪早发现，且有相应之处方，为之治疗矣。然则中国对世界文化之贡献，夫岂四大发明而已哉！盖中国科技史料之发掘与整理，从而发扬光大之，实为我炎黄子孙责无旁贷之大业。时因撰写《郑钦安传》，强调其对伤寒学之贡献，遂论及葛洪对注病之发现与相应之治疗，非辞费也，盖有不得已于言者矣。

1988年春节于北京晓传书斋利器氏志

傳醫

李

一
好



总 目

- 阴阳为纲,辨证论治(代序) (1)
 郑钦安传 王利器(9)

医理真传

- 郑钦安原序 (1)
 序 郭子光(2)
 前 言 (4)

医理真传卷一

- 乾坤大旨 (6)
 · 坎卦诗 (8)
 · 坎卦解 (8)
 · 离卦诗 (11)
 · 离卦解 (11)
 · 气、血两字作一卦解 (13)

君、相二火解	(13)
真龙约言	(17)
五行总括图	(19)
三焦部位说	(26)
五运所化	(27)
司天在泉图	(27)
五行本体受病相传为病	(29)
论气血盛衰篇	(30)
辨认一切阳虚证法	(32)
辨认一切阴虚证法	(35)
外感说	(36)
内伤说	(38)
望色	(39)
闻声	(41)
问症	(43)
切脉	(43)
伤寒六经提纲病情	(46)
六经定法贯解(附解)	(47)
太阳经证解(附解)	(49)
阳明经证解(附解)	(53)
少阳经证解(附解)	(56)
太阴经证解(附解)	(59)
少阴经证解(附解)	(63)
厥阴经证解(附解)	(65)